

《中国女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女工》

13位ISBN编号：9787510807848

10位ISBN编号：7510807840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潘毅

页数：214

译者：任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中国女工》

内容概要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曾获得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美国C.WrightMills2005最佳书籍”奖项，使潘毅成为自1964年该奖项创立能来的首位亚洲获得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是一部关于打工者主体的权力、欲望与抗争的民族志研究专著，也是一部关于打工妹的政治学，作者潘毅为读者呈现出了工厂中支配与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打工妹生命中所经历的梦魇、尖叫与身体痛楚，正是她们在国家、资本与文化的巨大张力中进行抗争的最真实形态。

《中国女工》

作者简介

潘毅，女，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四年分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一九九八年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书籍目录

导言
是社会行动者？还是打工者主体？
打工者主体的生成
主体、欲望与抗争
田野地点和田野工作者
全书概述
第一章 国家与资本：中国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与消解
打工者主体新释
中国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与消解
清河村：一个农村公社的变迁
外来工城市——深圳
劳动力使用的技术
模糊的身份：工人力量的根除
第二章 背井离乡：农村女性的挣扎
城乡迁移与亲族网络
重述女性命运
夹缝中的挣扎：异化劳动与农村家庭生活之间
冬：“这不是我第一次出来打工。”
春：“有时候我不得不为自己活着。”
经历对立
第三章 社会性身体：规训与抗争的艺术
中国工人：“社会主义”的身体
空间的艺术：生产线上的定位
一种权力技术：装配流水线
速度、控制与反抗
规范劳动习惯：作息时间表
时间观念：1996年1月19日
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工厂守则
电子眼：全景敞视主义原则
第四章 当上打工妹：身份认同与差异的政治
摸索身份认同：一上班第一天
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身份认同：美芳的到来
成为工人：城乡差异的政治
训导会上
地方及血缘——族群身份认同与不平等
工资制度与分化
日常的偏见与适应
语言与身份认同：车间的广东化
第五章 性与性别的想象
打工妹：非单一化的主体
渴望性主体
性与性化身体的泛滥
召唤性主体
性别分工
性倒错的身体（perverted bodies）
女工打架
女人们的谈话

闲谈与说笑

消费主义欲望与现代自我

外出购物

第六章 工厂里的尖叫、梦魇与叛离

尖叫

个人创伤

慢性疼痛：身体与工序

月经政治：女性时间与工业时间

资本的阴谋诡计

阿英的痛楚：在身体与社会之间

扭曲的自我

梦魇、尖叫与抗争

第七章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一种抗争次文体

多场域的抗争（muhisited resistance）

英文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

政府文件与出版物

报纸与杂志

章节摘录

打工者主体的生成 “打工”意味着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尤其是在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情况下。“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身份。“打工”一词来源于香港的方言--广东话，在香港，劳动关系主要由市场决定。简而言之，“打工”就是“为老板工作”，带有强烈的劳动力商品化或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意味（Lee 1998a）。在过去的20多年里，“打工妹”和“打工仔”成为两个在中国被非常广泛使用的词汇，与“工人”，即无产阶级--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更加普遍使用的词汇形成对比。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在社会中享有为农民阶级所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政府宣扬工人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再异化于劳动，而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是普遍存在的。工人是社会主义中国将劳动力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实现自我的新型主体的理想类型。实际上，在过去3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是为国家工作的，而国家则不仅给工人发工资，同时还为其提供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弟教育等福利（Walder 1986）。总之，它是中国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打工”不仅仅意味着离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而且也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劳动关系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保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是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打工的价值，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家榨取其劳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换句话说：“打工”一词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仔/妹则是清楚劳动剥削、具有工人意识的新蜕体。 ……

《中国女工》

媒体关注与评论

潘毅写了一本充满“社会想象力”的书。她能够得到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米尔斯奖”，的确是实至名归。——梁文道 “如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正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潘毅的著作应被视为必读书”——Andrew Ross, *Low Pay, High Profile: The Global Push for Fair Labor* 作者 为了探索女性生命中无法逃避的社会暴力，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者主体的漫漫长路，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潘毅

《中国女工》

编辑推荐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曾获得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美国C.Wright Mills 2005最佳书籍”奖项，使潘毅成为自1964年该奖项创立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

《中国女工》

精彩短评

- 1、潘毅的调查是很出名的买这本书也是慕名而来 内容很充实但是书受损严重 书皮被折了一道大痕 尘也很多 有些尘都抹不掉了
- 2、一直以为叫maid in china呢
- 3、去港科官网找老师邮箱去...
- 4、我们老师的老师写的书，更像是在用小说的手法来陈述一件事儿，没有深入的分析。有的地方牵强附会。
- 5、中文版发行太晚，书里的有些分析显得有些陈旧。“半农半工的主体并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结构与关系。相反，这种新型打工主体呼唤出一部反叛的诗学，它是多阵线的，更加富有创造性...更具有穿透力”这句话很有启发 但没有更深的阐述
- 6、漫长.....
- 7、对我很多启示的书。几乎逐字逐句读完，11面A4摘记，围绕主体与微观权力来讲，抗争部分的写作很具前瞻性。不过自我感觉有些语言稍显累赘与浮夸。
- 8、福柯无处不在~
- 9、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群体是有益的，但是有的地方读的人来气，能不能综合考虑一下中国国情，潘毅对于社会中人情世故的态度有时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天真’，用事实去套已经认定的理论或结论而两者之间缺少逻辑性分析的连接，最终也没有发散引申还在局限于打工妹团体，可惜lian儿了
- 10、令人触动的人类学阐释性研究，阅读作者生动、翔实的叙述，仿佛生活在这个被三重权力压迫的女工电子厂内，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 11、收获很大。内地学者跟潘毅比简直一泡污，
- 12、书本是正版的，很好。
- 13、一开始很吸引人，到最后也觉得蛮好看，回头看看，似乎也没说什么啊.....好吧，我没看懂
- 14、其实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新工人民族志变成类似“弱者的武器”一样的东东.....
- 15、她们都在拼命抗拒着自我分裂的可能，捍卫着打工-主体的自由：一种带着人类的尊严将自身融入生活世界的自由，一种对自身所遭受的社会暴力发起反击的自由。
- 16、纸质比较薄，不过这个价钱也值了
- 17、引封皮：“一部惊心动魄的民族志”。
- 18、心中期待很久的著作。
- 19、新左
- 20、关于90年代国家与地方对劳动力及人口控制的部分，的确涨了不少见识。可以看出作者的采访做的不错，但是写作上觉得有些太过学院派。拿毛时代工人、女人与女工做直接比较显得跳跃。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分析与实例的结合稍差一些。
- 21、有这么一个群体，游离在城市与乡村间，夹在模糊的阶级认同和父权统治里，与经济发展裹挟在一起，这本书是描写此群体的生活志。其中一个章节讲到精细分工中人技能被弱化，重复用低端技能换去个人价值的例子，值得互联网和IT从业者反思。总之，此书能出版已属不易，值得一看。
- 22、她是学社会学的，很喜欢潘毅老师的书，也希望她能喜欢我。
- 23、潘毅老师的理论功底深厚，值得细读。
- 24、#一刷##等笔记#
- 25、在烦躁的一天读完了这本书。觉得很沉闷。显然，作为一个作家，张彤禾更了解普通读者的喜好，同样写女工，《打工女孩》比这本书轻松有趣的多。潘毅完完全全是个正统的社会学家，全书充斥着马克思、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论观点，前几页完完全全就是文献回顾。这样写有个好处，就是诠释了女工，而张作为一个记者只停留在“描述”。然而，这种诠释存在着许多毛病，它仅仅反映了社会学家眼中的真实，对于女工自身来说，有时并非如此。
- 26、“资本主义的实践逻辑需要战胜所有非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才能巩固它的霸权。为了获得权力、赢得战斗，必须彻底摧毁所有与其不同的生活方式。”语言战争：以政治获得正统性的普通话，与以地方市场获得合法性的粤语。时间社会学：时间控制了人，而不是人控制了时间。阶级的形成与解构：社会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联合创造了事实上的阶级，但又尽最大可能消解阶级话语与阶级行动。身份认同政治总是差异的政治，其标准基于性别、地域、阶层、语言、城乡。召唤性别身份的话语

《中国女工》

，要的是更为驯顺的生产身体。”玩笑“作为解构异化劳动的武器，让我想起丁学良曾讲到的幽默作为解构极权统治的武器。无处不在的歧视折射人性的卑劣，但人也正是在歧视他人中确证了自我。被劳动异化的客体，以及通过消费赢得的主体。女性时间与工业时间。国家、资本、父权制。

27、砚菲老师的课堂阅读材料。。之一~

28、为了在疯狂的工业社会中生存下去，为了面对社会异化，人类所能做的只能是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统统撕裂。——说的何尝不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29、15年：非痛苦表达痛苦化，对潘毅最有力的批评来自“劳工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14年：行动者主体的概念开始挺吸引我，但读到后面觉得缺少思辨，并且没有真正和田野打通(有可能是我没看懂?)。统治术部分平淡中有惊喜，不过如果自我形塑的细节刻画再细致点就更好了。四星减一星是觉得对阶级这个概念用力过猛，可以稍稍收回点情绪啦~#我真是擅长煞有介事地评论#

30、underwhelming

31、几次读的摇头叹息，心酸不已。一本充满了疼痛感的民族志。mark与《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篇》能对接的部分：邬霞的《吊带裙》和打工妹以自我形塑技术为目的的消费实践，消费并未把打工妹的松散同盟粉碎成原子化个体，而是给她们带来想象性的连接，这与邬霞对吊带裙的持有者的善意有同构性。同时可以代入未被言明的“工衣”和“吊带裙”之间的对比张力。流水线和规训的身体的关系不用赘述，关键在找相应的叙述身体机器化的诗歌。疼痛叙事的关键则在于强调疼痛是一种对生产机器的生理—社会性反抗，不过我的问题是疼痛和伤残似乎不能被纳入一起讨论？这本书没涉及到工伤问题，需参考其他文献。

32、值得尊敬的书，比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强多了

33、借用马克思、福柯、布尔迪厄等大师的理论，结合田野调查所得，对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形成、抗争、心理及窘境等作了细致的剖析，比张彤禾《打工女孩》更有深度。《中国女工》说打工女孩即使赚了钱，在家里依然没有话语权，但《打工女孩》呈现了一个反面的例子：从外面赚到钱，在家里有更多话语权。也许，在中国社会里，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吧？根据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在外打工赚到钱越多，话语权越大，无论男女。

34、感觉潘毅老师身上有一种calling，真是好喜欢她。看见有人说这本书翻得好，其实原著的语句就很简洁明了。另外我感觉这本书能获奖的原因除却治学严谨等因素以外，可能还是潘毅老师抓住了当时中国的脉动，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时代潮流中，并且这项研究也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吧

35、关怀归关怀，但仍然不喜欢这类理论和立场先行的作品。压迫叙事一直都是个大坑。

36、“具有想象力”真是很好的描述；后结构的许多语句就是在缥缈和混沌中才有点意义嘛，想吐槽也没用啊

37、第一我觉得用中国这个字眼不太合适 第二 本书的节奏把握的很有分寸 系统而全面 只是对性和性别定位还可以更加深入 而不是这么略显仓促 第三 毕竟是学者 很难做到感同身受 真正被捆绑在制造业的女工远比作者观察的要无奈和不安

38、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外人and比较了解打工群体的人，我看这本书是比较满足了，有专业的分析，内容也比较详实。我总是比较宽容的嘛23333，不能要求一本书面面俱到解决所有问题啊。

39、我还没有进幼儿园的时候对于长大的理解来自那些十七八岁的辍学的女生在小屋子里贴在墙上的电影明星贴纸，还有凤凰电影台那些“未满十八岁”不准在无大人陪伴下观看的警告，将要去打工的大姐姐对城镇的向往诉说。看这本书我已经和书中人一样大了，看完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有空整理细写下来...

40、可能因为我在南方工厂工作过的关系，这本书，我看着两次，两次都落泪。潘毅写的故事的真实，描写人的细腻，还有，她发自内心的对人的爱，关怀，对社会的质问。所有所有我曾经感同身受。除了我们普通百姓了解到的（想象到的）女工的生活现状，潘毅作为人类学的博士，她在分析事件的观点，又让我学到不少东西。因为看到这本书是翻译过来的，我才查到潘毅当时是用英语写的原著。所以我又在英国亚马逊订购了（英文原名叫 made in china）。她的初衷是按研究方向，论文的形式来写的，所以文字把持很平稳，中肯，没有太多的感叹。但是从她的每个一个词，我看到她，一位人类学家，对人的真正的爱。强烈推荐。

41、由《打工女孩》引导而来的。

42、当作一篇很正式的paper看完，冲击力很大。洞见与想象并存。p.s任老师说大陆版主体对应class。

《中国女工》

- 43、一片博士论文写的都如此针针见血而又具有可读性，在这片田野里作者真是煞费苦心。即使是时隔快十年的今天，这本书在读起来依旧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 44、虽然有些地方冗繁，但是看了肃然起敬……
- 45、蹩脚的人类学家，蹩脚的一本书
- 46、一直记得的当时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规训在现代时间法则里的社会工具
- 47、蓝猫织布厂女工生存状况民族志
- 48、是我
- 49、读完《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回过头来读此书，前者给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框架，潘毅给了更多的细节。相比之下更喜欢她的基于一个深入的田野的这本书。|第六章关于女性时间（以姨妈为切入点到达女性生命过程）社会时间的不可整合很有趣。
- 50、才疏学浅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潘毅那么不满意这本书，文本无法和研究对象共享，西方脉络的理论框架近乎生硬。尽管“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将主体放在新的叙述中本身就在国家、市场和父权制三种力量下撕开了裂口。性别想象和梦魇两章读起来尤其好：在“没有固定的边界、没有稳定的参考框架、没有可以供新型主体避难的港湾”下成为女工；在工业的线性时间里面以女性身体遭遇月经政治，在突然的尖叫声中民族志学者感受到了田野中的迷失，在规训的要求下如凯博文所言地用疼痛经验反抗。
- 51、中国女工的痛，不仅在于资本压榨，还有城乡之间的隔离以及父权制家庭的阻力。三座大山造成了一个个伴随着梦魇却又无能为力的女工们。
- 52、不喜欢不习惯这种写法。攀枝花火车站
- 53、内容5星，4星给渣腰封。梁文道给畅销书做做序也就算了，好好一个民族志非得加上他不伦不类的推荐语，差评！
- 54、挺差的，人类学民族志都写成控诉万恶资本主义了。装逼痕迹明显，连“真”旁边还打个括弧（Real）。稍微有点启发性可能都是沾前辈的光，原始资料收集可能还没何伟得多。
- 55、真实而有力量。女工是国家、资本、父权三重威权塑造的群体，非深入其中无法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对劳动者的影响。

章节试读

1、《中国女工》的笔记-第65页

人类的生命与时间之间变成了侵略与征服的关系，这是一种异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生命被迫要去追赶时间，好像时间是一个外在的，要去占有和征服的客体。就这样，生命本身完全被时间异化，变成了一股由支离破碎的时间所汇成的流。现代人仿佛是在时间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将时间的流逝体系化的后果便是个体的身体完全由时间掌控，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还是努尔人比较幸福。

2、《中国女工》的笔记-第96页

6.5 女人们的谈话

接下来连续几天晚上，女工们在宿舍里都在谈论锅炉房的打架事件。每天晚上十点半左右通常是女工们的闲聊时间。由于女工们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在沉默中工作，因此谈话成了工厂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每天晚上，女工们一洗完澡，就会和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同乡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儿，这种情景在宿舍楼里随处可见。我经常听到男人抱怨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七嘴八舌」这个成语经常用以形容女人们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的状态，这个充满贬义的词汇公开表达了男性试图让女性保持沉默的权力和欲望。长期以来，女人之间的谈话一直被视作对父权制秩序，以及管理秩序的威胁（Spencer 1980）。

一到晚上，女工们谈论管理者；交换人事政策上的资料；讨论谁又因为违规而受罚，谁又交到了男朋友，以及谁总是和女人搭话令人讨厌等。她们谈论性、谈论生孩子、谈论家庭，有时候也会抱怨食堂的伙食。因为我会讲潮州话，所以有时候会加入潮州女人的谈话。有一次，几个潮州的年轻女工一起围着两名40多岁的潮州厨工抱怨工厂的伙食。

「阿姨，你觉不觉得我们食堂的东西太难吃了？」，其中一个叫兰的潮州女孩儿问道。

其中看上去年轻一些的厨工马上回答说：「姑娘啊，我也不想让你们吃那么差的米啊，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尽力伺候你们了。」

「但是阿姨，饭菜都馊了，我看就是拿去喂猪，猪也不会吃的！」兰继续说道。这时候另外一个看上去年纪大些的厨工阿金打断了兰的话说道：

「喂，姑娘们，不要说话这么难听，会遭报应的。你们还年轻，从来就没吃过苦，没经历过困难时期。60年代闹饥荒的时候，我们连野菜和树皮都得吃！」厨工阿金的语调很伤感，为了说服这些年轻人，她讲起了自己在困难时期的经历。

「哇喔！阿姨，你说的事情也太可怕了，但是现在时代不同啦！」童童打断了阿金的话说道。

「你们都太懒了，生在这个年代太幸福了。你们根本不知道过去的女人有多苦。你们现在穿漂亮衣服，自己能赚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年轻的时候谁能像你们这样？我们连做梦都没敢想过离开家，离开乡下。女人是要守在家里的，煮饭、做家务、嫁人、生儿子。」阿金一连串儿的话把所有人都逗笑了。她也感到轻松了一些，于是继续向这些女孩子讲述「女人的苦日子」。

「你们还不懂做女人是怎么回事，没吃过苦你是不会明白的。你们呀，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你们以为将来嫁了人就会幸福。但是到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孤单，那个家是男人的，不是你的，永远也不会属于你。你婆婆会成天盯着你，挑剔你，连你丈夫也帮不了你。而且如果结婚两年你还不下蛋（生儿子），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日子在等着你了。村里人就会到处说你的闲话。……等你肚子大（怀孕）了，又要忍受十月怀胎的痛苦，还有生孩子的时候，那真是疼啊。……你们还年轻，那种疼你们根本想象不出来。简直疼死人，疼死人，但每个女人都能熬过去的，这就是女人的命啊。你们永远都不会懂的。」厨工阿金「兴致盎然」地叨咕着。

「哎呀哎呀，阿姨，你们那个年代早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随便从家里跑出来打工啦！」童童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进城打工经常被视作可以取代结婚的一种选择。但是对于已婚女性来说，离家进城打工只能是暂时的逃避，她们作为妻子的性别角色并没有发生改变。

「你说的都是孩子话。你老了怎么办？工厂还会要你？女人始终是属于家庭的！你们都不相信我

的话？是不是？」阿金感慨地说。

在工厂里，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以及不幸的生活遭遇是女工们的主要话题之一。通过女性之间的闲谈，充满压迫的女性生活历史（尽管经常是充满想象、夸张，以及冤屈）被口述给年轻一代（Anagnost 1997）。女性的生活经历经常是被排除在正式，以及官方的文字记载之外的。在由男性书写的历史中，她们的经历常常被边缘化和琐碎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然而，剥夺女性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力却无法封缄其口。被压迫者不能发声是不真实的，女性在父权制的压制之下不能发声是不真实的，仅仅只有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问题」也是不真实的（Ardner 1975, 10）。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谁会去倾听她们的声音？谁愿意在支配与权力的罅隙间侧耳倾听这些被压迫者的窃窃私语？中国的女性历史建构出漫长的口述历史传统，并借助记忆和想象代代相传（Croll 1995, 11-12）。这些女性的故事有助于解释女性的生活世界，并且可以帮助女性理解其自身的经历。女性之间的谈话是丰富的文化资本，它提供的不仅仅是各种故事、范例与模式，而且还有一部活生生的系谱，女性可以从这个系谱中学会如何作为女性主体与自身进行抗争。

3、《中国女工》的笔记-第74页

电子书页码

“一个人认同自己的某种身份，不是因为遗传，不是因为因果关系，不是因为生物性因素的合理性，也不是因为宿命的态度，而是由于特别复杂而精细的权力技术与策略。另一方面，内化所需要的是更加迂回曲折、痛苦甚至反常的自我形塑方式。”

4、《中国女工》的笔记-第87页

在工厂里，工人们最厌恶的除了人事部的职员之外，就是作业分析员。他们全是男性。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出现在车间，通常是手里拿着计时器，站在女工们身后计时。男性的支配和女性的服从形成鲜明对比。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提出建议后，命令就会传达下去，于是女工的身体便不得不再一次重新适应新的工作节奏。事实上，作业分析员不仅完成每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还研究身体的动作——包括姿势以及身体动作之间的空隙。绝对不能浪费时间。身体的每个动作都必须通过测量和纠正。身体与身体之间的距离、身体与传送带之间的距离以及椅子、桌子和架子的高度全都要经过精心的测量和计算。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尽可能经济地利用；决不能浪费任何“剩余”动作，决不能浪费任何“剩余”劳动力，至少可以说，这是生产机器的梦想。当非虚构类纪实文学已经读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时候.....

5、《中国女工》的笔记-第77页

在本章（第三章 社会性身体：规训与抗争的艺术）中，我将探索这间深圳工厂（流星厂）的特殊实践。我的关注点是工厂通过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过程对劳动力——尤其是打工妹这一女性身体的劳动力——所进行的榨取，这也是通过全球规训权力所进行的个体化过程之一。正如我在流星厂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人的身体进行个体化是生产性经济的目标。除了对工厂的一般性技术和纪律进行研究之外，我还将探讨关于个体化身体的论述政治中的生产机器的假想工程（*imagineering*）。在后社会主义中国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它的独特性、它的权力及话语模式可以很轻易地就被识别出来。而且，我还将试图超越支配与反抗关系的二分模式。如果将历史行动者们的日常生活策略之复杂性，简化为一个比喻的话，就好像一个钟摆摆动的两端——一端压迫，另一端则反抗。“机灵的身体”这个概念凸显出日常实践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这些日常实践往往深嵌于支配与反抗的多层次关系之中（Certeau 1984）。无论女性的劳动身体是“驯服的身体”抑或是“机灵的身体”，她们总是处于一种利用情境性机会，甚至利用霸权论述来保护其自身的“抗争结构”之中。她们多姿多彩的行动（尽管有时候会弄巧成拙），粉碎了规训权力将其塑造成为物化而单一的身体形象的企图。

6、《中国女工》的笔记-第81页

《中国女工》

语言的对抗，尤其是车间的方言政治，进一步加剧了对城/乡、地方及族群等身分认同的争夺。语言是一个差异的系统，是在诠释社会事实的社会性差别、层级体系，以及分化等共同构成的网状结构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47 正如Bourdieu (1991, 52-54) 所言，合法性语言的斗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对身分认同、地位，以及权力的争夺。身分认同政治深陷于语言政治之中。一个人说什么方言，带有什么地方的口音，这些都至关重要。在工厂中，一种方言的层级体系被有效地运用到「语言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是与围绕工位、资源，以及权力而展开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在工厂里，语言战争在不同的战场上展开，并且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首先是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的较量。普通话是中国的官方语言，具有政治上的优越性。但是在广东省的很多地方，普通话对于广东人却失去了它的这种合法性。为什么国家的官方语言会让位于当地的方言？这个现象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对社会生活的管治上，国家的政治权力已经开始让位于地方的市场力量。两种语言的战争，不仅反映了国家与市场对社会生活管治权的激烈争夺，并且制造并左右了这场争夺。在工厂，尽管普通话仍然被普遍使用，但是不再拥有权力、优越性或者霸权地位。而另一方面，广东话作为商业语言在塑造工厂层级体系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工厂的高层管理者都是香港人，中层管理者也大都是来自广州、中山，以及顺德等城市的讲广东话的人。因此，广东话是工厂的管理语言，是会议，传达命令，以及管理者们的日常冲突之中普遍使用的语言。

于是，精通广东话成了在工厂层级体系中向上流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会广东话增加了一个人获得提升的机会，这是因为，讲广东话不仅能使一个人更好地与上级沟通，同时它作为相同惯习与表达方式的一部分，使一个人更容易被管理文化所同化。总经理周先生和另外四名香港的管理者从来不讲普通话，即使他们知道别人的广东话讲得不好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坚持使用广东话。对于他们来说，广东话是一种文化资本，是代表自身地位与身分认同的一个符号，有助于他们更加有效地行使其权威。这种语言的权力在个人身上的运用，既非无声无息，也非不落痕迹，相反它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那些本非讲广东话的处于下层地位的人，如果能够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将会获得赏识，以及较大的提升机会。而那些不懂广东话的人则不得不因为误解了上级主管或者其他人的意思而付出代价，而且还要忍受因此而产生的焦虑。如果一个人不想一直处于工作层级体系的底层，那么就要学好广东话，至少能够掌握到足以在工厂里生存下去的水平。

尽管作为商业语言的广东话已经在这场语言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反叛和抗争依然在不断地发生。在车间里，当一个处于较高地位的讲普通话的管理者恰好碰上一个讲广东话的人的时候，这种紧张状态就会变得尤其尖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程部人员与生产部人员之间的沟通。生产部的人员不管是来自广东还是外省，都已经被同化为以讲广东话为主。而工程部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们大多是来自北方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对于广东话表现出一种毫不让步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一口带着北京口音的标准普通话仍然是其资格、地位，以及自尊的象征性标志。这些年轻的专业人士们即使懂广东话但却仍然会坚持使用普通话。当工程师们和生产部人员讲话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有趣的冲突。一方讲普通话，有意识地维护这种来源于其政治资本的国家官方语言的优越地位；而另一方则是讲广东话——工厂和地方工业世界中的官方语言。双方当然都清楚地理解彼此的意思，但任何一方都不肯作出让步。

生产线上的沟通就更加复杂，尽管冲突似乎并不那么尖锐。当组长向她（他）们的主管汇报工作的时候，她（他）们通常讲广东话。但是当她们（他）们与线上的女工——尤其是外省人一讲话的时候，则宁可使用普通话。大多数的组长原本来自非广东话地区，有些来自潮州地区，有些来自客家地区。对于她们（他）们来说普通话和广东话都属于「外语」，她们（他）们会根据情境适当地使用这两种语言。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况。D线的组长珊来自湖南，她在生产线上工作了四年之后被提拔到现在的位子上。她极少和主管或其他组长讲广东话。作为车间里的一个强硬而能干的角色，她被提升为组长不是因为她能够将自己同化到管理文化中去，也不是因为她与高层管理者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而仅仅是因为她的工作能力，以及严格的纪律性。珊是车间里最令人讨厌的人之一。她对待线上的女工从不客气，经常大声地用普通话训斥她们。反过来，女工们也经常拿珊来取笑，尤其是讲广东话的工人们：她们模仿珊的普通话和口音，让人们注意到她的「非管理性」语言，以此来贬低她的地位和权威。

她对讲普通话的坚持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有一天我问她，「珊，你为什么总是讲普通话？你会讲广东话的，是不是？」

她回答说：「我就是忍不住要讲普通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来深圳打工一年之后就能听懂广东话了，但我不想说，除非迫不得已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广东人。他们总是太骄傲自大了，

《中国女工》

他们觉得自己有钱，所以别人就都应该说他们的方言。」

但是珊是独特的，这是与霸权语言进行斗争中的一个特例。而工厂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忙于（或者是被迫）加入到这场语言政治的表演之中。

这场战争的第二个方面是广东话方言之间的内部冲突。语言的机器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分化基础上制造出层级体系，它需要在广东话自身的内部分化中建构出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异。在工厂里，广东话被进一步区分成不同的风格和口音，例如香港的广东话，广州的广东话，客家的广东话（乡下话）和广西的广东话。口音是文化资本的耻辱性标志，不仅是对隐蔽的权力还是对公开的制度化权力都刻上了层级的记号。在流星厂，一个人的广东话发音愈接近香港和广州的口音，那么其地位和权威就会愈容易获得认可。很明显，一个人在管理层级上的位置愈高，那么他讲香港或广州广东话的可能性就愈大。经理助理和主管们都精通流利的香港广东话，因为他们经常与香港的经理们接触，而且他们大多原本就是讲广州广东话的人。管工和组长们主要学习广州的广东话，因为他们经常和讲广州广东话的主管们交流。不同口音的广东话赋予个体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也影响到她（他）们在与上级主管进行斗争，以及争取新身分认同过程中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工人们不努力改变口音，反而坚持讲乡下口音的广东话，那么无论她们自己是否觉得比讲普通话或者其他方言的人优越，她们都依然属于这个内部层级体系的底层。

怡萍是一个广东的客家女孩，我刚开始在流星厂工作的时候，她在办公室做接待员兼接线员。她为人友善，而且长得漂亮，是从生产线被提拔到办公室工作的。但是经过一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她又被重新安排回到生产线上工作。至于工作调动的原因，办公室的秘书玲抱怨地对我说：「她连『林』和『玲』的发音都分不清楚，而且也听不出这些发音之间的区别。她总是把电话转错人。」……「她是个农村来的客家人，广东话说不准。而且，她也不知道怎么应付那些不受欢迎的电话和人……」虽然玲是潮州人，但却能讲一口标准的香港广东话。

一天晚上，我在宿舍见到怡萍，她正在听香港的流行歌曲。工作调动仍然让她感到很受伤害，并打算要回老家。「我不想在这里工作了。他们让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如果他们不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就去别的地方。」但是事实上，怡萍很清楚是带有客家口音的广东话对她不利。她努力尝试改变自己。她尽可能利用机会和我说话，希望我能够教给她一种更加文雅、并且具有更高价值的广东话。听广东歌是她喜欢的另外一种学习广东话的方式，她经常会在宿舍里放声高唱广东话的流行歌曲。

7、《中国女工》的笔记-第73页

我在本章（第二章 背井离乡：农村女性的挣扎）中主要强调：应该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农村女性的打工欲望以及她们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挣扎。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一个流动社会的真实欲望，被社会主义的国家及其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人口驾驭着，摇摇晃晃地朝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方向冲去。政府希望用一种混杂的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缩小现存的社会分化，而实际结果却是扩大了社会分化，尤其是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之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向东部流动的巨大欲望，无非意味着社会底层正在试图挑战着上层制造出来的这种看似不可逾越的社会分化。作为一场开始于社会底层的“社会革命”，农村人口向城市迅速而大规模的流动，反映出试图填平社会鸿沟的个体与集体欲望的沸腾与挣扎，仿佛这是她（他）们逃生的唯一希望。然而，城市没有感谢（甚至没有接受）农民工，而是将她（他）们视为“盲流”。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她（他）们，而与此同时，在官方论述、大众媒体以及城市日常生活中，她（他）们所遭受的却是严重歧视……

8、《中国女工》的笔记-全书

为了探索女性生命中无法逃避的这些社会暴力，在社会主义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背景之下，我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主体的漫漫长途，并尝试在当代中国--它正迅速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提出一种社会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晓明的生命中不断闪现的火光、疼痛和记忆，凸显出这个时代的创伤，细诉着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者生命之中的社会抗争。

《中国女工》

一般来说，工厂大火之类的社会创伤预示着社会暴力，也呈现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这三者联手创造出一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分别来自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这三重压迫相互支持，彼此强化，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体系，向全球化生产开放时代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新蛻体（configuration）。尽管这些压迫仍然依附于其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但它们正在迅速地发生着转型和重构，正在迫切地寻找新的权力和实践模式来进行社会管治。毋庸置疑，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将中国重新定位为「世界工厂」是跨国资本的一个精心安排。这种安排从一般意义上为新兴打工阶级，从特定意义上为新的打工妹主体的孕育提供了基础。

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由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构成：一股力量是国家对社会治理模式，以及社会政治工程的变革；另一股力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资本化和市场化，国家将其冠以「追求现代性」或者「为了全球化」之名，并且提出了要「与全球接轨」的口号。「政党-国家-计划经济」

（party-state-planning nexus）模式曾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因素，现在却转变为「政党-国家-市场经济」模式（party-state-market complex），权力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这些都导致中国社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冲突和紧张，而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抗争也必将随之出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国家向全球资本开放并导入市场机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挽救执政党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于是，市场和国家联手承包的这项社会工程，使中国社会遭受双倍的创伤，承载三重的压迫。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国家权力与跨国资本的联姻都将生成新的控制形态。这一次，无论是土地还是劳动，无论是自然还是生命，都被「市场化」为商品出售，而操纵这场「市场化」的，不单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包括「社会主义」的国家。无论怎样，改革时期中国中央权力的「去中心化」，以及意识形态作用的式微趋势，并不意味着国家退出了对社会生活的管制。

打工妹中的大多数是年轻的未婚女性，仍然要为外出打工和婚姻自主而进行抗争。通常一到25、26岁，她们的家庭就会就是否允许她继续留在城市里打工作出决定（Pun 2000）。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如果还不结婚，通常被认为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大多数农村女孩儿都渴望结婚前能够在城市里工作一段时间。大多数打工妹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她们往往为了结婚而辞工并重返农村生活（尽管她们对这种命运并非没有抗争）。而她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18-25岁），就这样被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征用、掠夺，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外来工们作为城市过客的两大特点--无常和游离，也给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集体性的阶级力量设置了障碍。然而，尽管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的形成道路被阻塞了，但是一有机会，外来工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罢工等集体行动。对抗性集体行动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抗争。

而她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18-25岁），就这样被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征用、掠夺，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性（用更加时髦的词来说即「全球化」）要求中国社会向跨国，以及私人资本开放，允许资本主义的制度与关系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生活，同时对其社会，以及文化生活进行管制。贯穿本书的最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体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而且，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分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

打工妹这个新型主体的系谱学的建立得益于Michel Foucault关于「自我形塑技术（self technology）」的洞见。在这个概念中，他明确提出要关注「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的一系列程式，它们要求或规定个体需要通过自我主控或者自我形塑的知识体系（self-knowledge）来确定、保持或者改变其身分认同（1997，87）。Foucault主张研究主体的形成历史与政治管治形态这两大主题之间的互动关系（同上，87-88）。关于主体性，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主体是如何在不同时间、不同制度背景之下作为一个

《中国女工》

可能的、适当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对象被建立起来的呢（同上，87）？关于政治管治的分析，最根本的问题不单只是对一般的「权力」概念进行批判，抑或仅将其作为一组关注他人行为的战略性关系来分析，而是要将其视为个体通过与他人关系的扣连（articulation）而进行的自我管治（同上，88）。然而，Foucault关于自我形塑技术的系谱学研究过分注重细致的个体化技术，这反而使他关于「扣连与他人关系」的论述没有被凸显出来。如果个体化真的是塑造现代自我的「技术」核心，如果真的像许多人期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个人需要掌握一种塑造现代性自我的重要技术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时候对这个过程进行追溯了。对这个过程的追溯，不能只是简单地两分为东方情境或西方情境，而是要呈现出这一主体化过程，是如何将使孤立个人的个体化过程与关系性或群体性的主体塑造过程都涵盖其中的。

在我开始着手打工妹研究的时候，除了借鉴Foucault的「自我形塑技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分析，以及性别与劳动的女性研究之外，我还参考了Alan Touraine的著作以及他所提出的「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这场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像晓明这样的外资工厂的打工妹们是经历这场转型的先锋之一。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是生活在变动社会中的一个游离的主体，她们的声音决不会轻易被任何主导话语（无论是知识话语还是政治话语）所湮没。

相比之下，毛泽东思想则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的经典分析是相对立的。毫无疑问，「阶级」的概念与为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中国农民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坚持宣称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关系的恣意性是如此明显，使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倒好像是一场「后现代运动」，并且发生在后现代主义思想活跃于社会分析领域之前。意旨（signified）与意符（signifier）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这种差异性既维持同时也破坏着作为象征性符号的「阶级」话语。而阶级话语对中国人主体-地位的蜕体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符号需要不时地借助群众动员来弥补意旨与意符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中国人主体的阶级身分并不是被曲解，而是询唤（interpellate）主体就位需要一种比经济或者物质更加强大的文化革命。

创造欲望和欠缺是市场经济的艺术，用Gilles Deleuze和Felix Guattari的话来说，它「在产品充足的情况下，刻意地创造出需求和需要；令所有的欲望蠢蠢欲动，并使人永远堕入唯恐自身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深渊（1984，28）。」从农村地区涌向城市工业区的巨大民工潮展现出打工的欲望，并且从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政治操纵着社会欠缺，使农民工们产生了填补这个空缺的欲望。然而，正如城乡差别、地区和性别不平等的系谱学所显示的那样，这个空缺被中国社会主义体系进行了历史性和制度性的修正。

中国农民希望将自身从长期的隔离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正好遇上企图控制农民身体的政治技术，因此农民将作为行动者主动展开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打工妹，作为一个以各种形式的合作、反抗，以及挑战为特征的特殊底层阶级，体现了支配与反抗这个双重过程，它们共同创造出这个复杂、叛逆而异质性的主体（Certeau

我将重点强调全球化中国的社会暴力本质，并以此来召唤一种新的抗争理论，这种抗争理论将超越个体的和集体的行动、非政治性的和政治的交战，地方性的和全球性的斗争等。我将在本章提出，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沉默的社会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主角正是这些新型的打工主体--打工妹。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连同女工们在「中国制造」的所有产品，必将遭遇强大的抗争与变迁力量。最后一个简短的结论标志着这个研究的（无）结论，并且期待着读者们开放式的阅读和思考。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由社会主义的表述政治「宣布」并创造出来的，「阶级」在其「相应的」主体尚未出现的情况下便被建构出来，可以说，国家机器为了创造出阶级行动者而垄断了询唤的权力。

《中国女工》

这种混杂，或者借用Foucault（1986）的词语来说，这种「异质空间」（heterotopia），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相遇的叙述范例，带给人一种时空错乱（anachronism）的感觉。到了夜晚，这个地方则换上另一番景象，到处是出来闲逛的工人们，她们通常也只能是随便逛逛而已。实际上，逛街（大多时候并不买东西）是女工们最喜欢的消遣。生产和消费是现代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它们为中国的打工者们制造出无数的梦想和承诺。

实业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是由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混杂产物。通过转制成立公司，清河村政府在管制外商投资和地方贸易等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自主权，毋须再受区、市等上级政府的干预。当地人认为，如果能够避开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那么地方就会获得更多的自由、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发展。清河村并不是一个特例；相反，它所进行的实践在深圳非常普遍地存在。80、90年代，很多的农村乡镇都迅速地实行转制而成为现代企业（Lyons & Nee 1994；Christiansen & Zhang 1998；Lin 1995；Oi 1995，1999）。在生产大队向日益私有化的公司实体转型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推动者」角色的与其说是资本，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同时作为一个公司，清河村充分反映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正如Jean Oi（1995，1999）所言，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农村发展模式是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典型范例，突出了地方政府将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整合，到以市场经济为本的国家社会契约之中的权力。

在当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不仅与政府官员高度重叠，更与中国的家族亲属网络密不可分（Bian 1994；Lin 1995）。资产阶级与政府官员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政府法团主义治理形态，这也许是导致新的阶级语言被压制或阶级失声的最大力量。这种法团主义治理形态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村落经济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就意味着市场经常被用以对社会不平等，或某些个人和家庭的劣势处境进行合理化。清河村的村民对近年来日益增加的财富感到很自豪，经常会向附近村子的村民或者来访者们吹嘘炫耀。然而，社区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对外来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却常常被轻视或者忽略。清河村的精英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分化」，他们只知道中央领导人们说过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那么其他的人自然就会被远远地落在后面。霸权阶级试图用开放社会来取代阶级社会的意图非常明显，至少可以在清河村的变迁中看到道一点。开放社会对阶级社会的「取代」离不开霸权论述的充分构想和严格管制，因此，这个「取代」过程应被视为一个被市场力量（它虽然无形但却不可抗拒）合法化的「政治过程」。

与东欧的改革一样，中国在全面的国家计划经济失败之后，决定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来解决社会危机，例如发展水平低下、就业不足、大量失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等问题，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国家计划经济的退出，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将所有权力都拱手相让给所谓的市场机制或全球资本。事实上，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给深圳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则试图将深圳规划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为了优先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当地政府毫不犹豫地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于是，在现代「大」都市的梦想与强化行政控制体系的欲望之间的巨大鸿沟中，深圳出现了剥削型的劳动力使用和管理机制。

1980年特区刚刚正式建立，就成立了深圳市劳务公司，它是深圳市劳动局属下一个专门控制劳动力供给的政府部门。成立劳务公司，主要是为了对外来劳动力进行管制。在改革初期的深圳，官方不允许外来人口自己到工厂直接找工作，而是必须通过劳务公司作中介，并接受劳动局的统一管理。80年代初期，只要外资企业有需要，深圳市劳务公司有权从全国各省市合法地调配劳动力。在深圳，每个行政辖区都有各自的区级劳动局和劳务公司。这些机构共同形成了深圳外来劳工管制与劳动用工管理的网络。在80年代前半期，经由深圳各个劳务公司调配的劳动力人数约为250,000人/年（深圳市劳动局1991）。到了后半期，这个数字上升到350,000人/年。广东省各市县纷纷在深圳设立驻深劳动管理站，总数超过60个，使深圳的劳务市场网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驻深劳动管理站主要是协助从各市县向深圳输入劳动力，同时帮助管理和控制外来工。尽管当地政府在劳动力调配上表现很积极，但是过高估计政府对劳动大军的控制能力仍然是相当危险的。

《中国女工》

中国沿海及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连同个体经济的繁荣加剧了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到农民们的生活(World Bank 1992, 1997)。

「打工」-词代表的则是一种比较低下的社会身分认同，即一个雇工的身分，「妹」意味着年轻的女孩儿，它不仅标识出性别，而且还表明婚姻状况：与「姐」相比，「妹」意味着单身、未婚而且比较年轻。因此「妹」通常意指较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打工妹」代表的是一种深嵌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分认同。

生产机器经常利用这些地方和血缘-族群网络来制造劳动分工和工作层级体系。在流星厂，所有重要的管理职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和血缘-族群等关系的影响。例如，一个人要当上组长不仅要看她（他）的工作能力，而且还要看她（他）在工人中的关系网络和威望。

有一天，C线的组长秀华告诉我说：「控制车间的日常运作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它涉及到所有工人的配合。有时候订单紧急，我们必须提高工作速度，而这往往需要所有人的合作。最可靠的人就是自己的亲戚或同乡，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圈子。」在工厂里，扩大自己的地方或血缘-族群圈子是最重要的政治手段之一，无论是支配群体维持其地位，还是弱势群体提高其地位都要通过这种手段。工厂中群体力量最弱的是外省人，尤其是来自北方的外省人，她们经常被称为「外省妹」或「北妹」，大多从事包装、锡焊等比较繁重的工作。在车间里，争夺「好工作」是家常便饭，每天都会发生。而工人们为了能够获得「好工作」，往往需要依靠其地方或血缘-族群关系的力量。另一方面，管理层也经常巧妙地利用地方及血缘-族群关系来加强对工人的日常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同乡或亲戚被认为应该对彼此的表现负责。毫无经验的新工人进厂后，介绍她们进厂的同乡或亲戚们通常会向她们传授经验。这样就为工厂节省了管理的时间与成本。如果新工人不遵守工厂纪律或者违反了基本行为守则，那么有些时候她们的亲戚或同乡也要为此承担责任（Hareven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程部人员与生产部人员之间的沟通。生产部的人员不管是来自广东还是外省，都已经被同化为以讲广东话为主。而工程部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们大多是来自北方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对于广东话表现出一种毫不让步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一口带着北京口音的标准普通话仍然是其资格、地位，以及自尊的象征性标志。这些年轻的专业人士们即使懂广东话但却仍然会坚持使用普通话。当工程师们和生产部人员讲话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有趣的冲突。一方讲普通话，有意识地维护这种来源于其政治资本的国家官方语言的优越地位；而另一方则是讲广东话--工厂和地方工业世界中的官方语言。双方当然都清楚地理解彼此的意思，但任何一方都不肯作出让步。

在流星厂，一个人的广东话发音愈接近香港和广州的口音，那么其地位和权威就会愈容易获得认可。很明显，一个人在管理层级上的位置愈高，那么他讲香港或广州广东话的可能性就愈大。经理助理和主管们都精通流利的香港广东话，因为他们经常与香港的经理们接触，而且他们大多原本就是讲广州广东话的人。管工和组长们主要学习广州的广东话，因为他们经常和讲广州广东话的主管们交流。不同口音的广东话赋予个体不同的文化资本，因而也影响到她（他）们在与上级主管进行斗争，以及争取新身分认同过程中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力。如果工人们不努力改变口音，反而坚持讲乡下口音的广东话，那么无论她们自己是否觉得比讲普通话或者其他方言的人优越，她们都依然属于这个内部层级体系的底层。

城市中，「消费的诱惑」引发出不可抗拒的消费欲望，甚至对于不具有消费能力的人来说也不例外。没有消费能力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欲望的力量会驱使她们去梦想、并制造出承诺，以及更多欲望。当我匆匆忙忙记下这段田野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这个承诺对于年轻的打工妹们的意义。

Foucault认为，梦并不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实现，也不是帮助做梦者逃避现实的「一种意象狂想」。应该说，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体验，蕴含着存在理论的终极可能。Foucault曾指出：「毫无疑问，

《中国女工》

梦绝非一种意象狂想，理由很简单，梦是一种想象的体验；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倘若精神分析不能彻底地解释它，那是因为它关系到某种知识的理论（1985，43）。」梦作为想象的体验，被理解为是人类存在的实践，以及超越的一种特殊可能。只有承认梦是想象体验的一个表征，一种可能打破并超越客体性与主体性（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之间二元对立的经验才能为存在提供在这个世界上自我解放，以及自我创造的经验。「梦：像所有想象体验一样，是超越的一个人类学指标；在这种超越之中，梦通过将自己变成世界，通过给予自己光、火、水乃至黑暗，以向人宣示世界。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意义告诉我们，梦以其物质性格，既在它的超越之中揭示世界，同时也以它的材料改变世界（同上，49）。」

在经典的中国农村场景中，河经常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分界线。一个女性过了河，便意味着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通常是跨入自己的婚姻生活。根据传统，女性结婚后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自己的夫家开始新的生活。而在当代中国，女性过河，离开家乡可被视为离家外出到城市打工。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全球资本的涌入，为农村女性追求新生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新的希望与新的欲望。放在一个超验（transcendental sense）的层面上来看，女性过河可能意味着旧生活与新生活的决裂；阿英决心要和现在的生命、所有痛苦，以及无法忍受的存在方式决裂。决意过河意味着她渴望在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那里有崭新的存在可能性，以及机遇。一个24岁的生命还太年轻，不应该枯竭。这是一个过客、一个放逐者的体验。尽管她实际上进退维谷，身体的痛楚更是将她撕裂，但那冲动、那呼喊，却正是她寻找新事物的强烈欲望。

国家和市场却并非仅有的权力来源，地方性文化实践--具体来说正是处于转型与重构之中的中国父权制文化--也加入了这场权力的角逐。性别化过程、性与性行为的规范，以及婚姻和家庭的主导地位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打工主体的性化过程。农村的家庭依然为打工妹们提供最重要的支持，以及身分认同，否则她们将不得不独自面对资本的要求。成为现代打工妹的道路正是悲剧发生之所在，女工们很快就会发现工厂的工作并不是改变她们生活的灵丹妙药，相反，工业劳动是对她们婚姻生活的一种新的异化，在中国，结婚生子仍然是农村女性的普遍实践。一些单身女性甚至为了逃离工厂劳动而梦想结婚，而在结束了城市的工厂生活重返农村之后，她们将继续为中国的父权制家庭当牛做马。三重压迫是我对中国打工妹命运的一种诠释，尽管这种诠释存在着过度普遍化，以及简化的危险。然而，面对这些不可逃避的压迫，一个新的中国打工-主体正在奋力超越所有这些（不）可能性的极限，挣扎着破茧欲出。

如果我们将个人主义视为西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罪恶产物，而将集体主义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危险物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必须既不偏向个人主义（因为它是为资本的逻辑服务的）也不偏向集体主义（因为这个名字它很容易沦为政治策略的牺牲品）地寻找一个能够对个体性与集体性进行反叛和重述的抗争议程。打工主体正在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并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化的抗争逻辑（它经常导致劳工的主体性在运动中被吸纳）。因此，打工主体应该开创一幅崭新的反叛图景，它是多阵线的，纵横交错地点缀于个体与集体层面之上，它所对抗的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因素，而且还有文化和心理经验。

9、《中国女工》的笔记-第36页

中国女性的东方式形象，进一步被大量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与性别的批判性研究，进行了充满讽刺性的诠释。大量关于现代中国妇女的研究使我们可以肯定，虽然「妇女解放」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革命目标之一，但是4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妇女解放」。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仍然是由家长制和男权制铺就而成（Johnson 1983；Andors 1983；Stacey 1983；Wolf 1985）。无论是解放前的革命策略，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政策，传统的家庭制度和意识形态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是还得到了延续和强化。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愿意积极推动家庭改革，亦未能针对父居-父权的婚姻制度展开任何反思和行动，结果往往是维持了男性中心的传统家庭结构（Johnson 1983；Stacey 1983）。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的优先发展战略令其他的社会变迁目标相形失色，甚至不惜以牺牲

《中国女工》

妇女解放的承诺为代价。

于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宏观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和父权制在实际上可以如此稳定和谐地并存，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中。

10、《中国女工》的笔记-第89页

对于私人和全球资本来说：「性化主体」对于创造现代性工程似乎至关重要。资本的政治技术包含一系列社会分化与层化的手段，其中，性的差异是管制的主要目标之一。正如我在前面曾指出的，打工妹与毛泽东时期的无性主体「工人」形成对照，它涉及到劳动身体的性化过程。「妹」一词专指年轻女性或女孩子。深圳，以及其他经济开发区中劳动力女性化的迅速增长趋势清楚地表明，基础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廉价的非熟练工人大多数是女性。尽管产业工人中也包括男性工人——打工仔，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工厂的劳动性别分工中，一旦需要他们，往往会将他们安排到与女工不同的工位上。因此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劳动力不再被当成是非性化身体，而是被视为性别化主体，这个主体更多是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性的存在（sexual being）」而非「阶级存在（class being）」。

以这种方式对劳动身体进行性化是资本而非国家的工程。只要将毛泽东时期的「工人」与当今的「打工妹/仔」这两种主体进行一下比较便可以理解。在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中，「工人」的性别差异是隐性的、多余的。女性被带入轻工业、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等「男人的世界」之中。在社会主义中国，官方话语始终宣称女性支撑着「半边天」，男性能做的事情女性也同样能做。在官方的管制实践中，通过宣传与制度化安排，性别差异被淡化得毫无意义。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解体，随着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破产，工人主体正在逐渐消失，甚至在日常论述中这个词语也变得过时，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平凡而单调的工业世界中的劳动力一定要被性化；劳动力的性别必须要被再造和管制，而不再需要遮遮掩掩。

“在官方的管制实践中，通过宣传与制度化安排，性别差异被淡化得毫无意义。”瞎说。

11、《中国女工》的笔记-第84页

口音是文化资本的耻辱性标志，不仅是对隐蔽的权力还是对公开的制度化权力都刻上了层级的记号。

12、《中国女工》的笔记-第3页

玩具厂的工作让我觉得很满足。虽然工作特别辛苦，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乐趣。我们有个计划，打算在回老家结婚之前，大家一起存够钱去北京玩儿，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啊。上周末是我时隔七年，第二次去天安门广场。

大风过后的北京，天气很好，天蓝得出奇。广场上人很多，大家操着不同的乡音，指这儿、指那儿。有一对八旬的老年夫妇，被儿女陪同到北京来一圆看首都的梦想。两个人互相整了整脖子上裹的大红色围巾，紧紧靠在一起，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合影留念。夕阳映在他们脸上，两人的眼睛都眯成了细缝。于是我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对他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13、《中国女工》的笔记-第14页

民族志学毕竟是一个被书写出来的构造。尝试对丰富而混乱的人类生活经验进行理解、排序、以及重构的民族志学研究永远是没有尽头的，因为这些经验从本质上就在抗拒着被模式化和概念化

14、《中国女工》的笔记-第1页

1民族志学毕竟是一个被书写出来的构造。尝试对丰富而混乱的人类生活经验进行理解、排序以及

《中国女工》

重构的民族志学研究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因为这些经验从本质上就在抗拒着被模式化和概念化。

2. 当我试图去理解一种完全陌生而残酷的生活经验时，最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尽管中国打工者主体的生活状况十分窘迫，然而这个主体的声音却不仅被国家机器建设现代化的轰鸣声所湮没，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不仅是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有时候甚至包括打工者主体自身）的普遍反感和憎恶。

3. 只有在个体的工人被询唤，并卷入到一种集体性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之中的时候，“阶级”才存在——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个人有意识地确立自身的道德政治地位，并被卷入到具体抗争的战场。在这样的时刻——不是更早也不是更迟——可以说，阶级出现了。

4. 与中国其他的经济开发区一样，这个主要由中国南方的外来工所构成的新兴打工者主体，作为一种力量，它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结构性的压制。资本集团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来遏制这个主体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些权力技术主要包括：城市化、国家体制等。中国打工者主体曲折坎坷的抗争道路将在一个特殊场景中被呈现出来，以便在历史与空间上为它的发展留下一个特写。

5. 在当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不仅与政府官员高度重叠，而且与中国的家族亲属网络亦密不可分（Bian, 1994; Lin, 1995）。资产阶级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政府法团主义治理形态，这也是导致新的阶级话语被压制，致使阶级失声的最大力量。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经常是被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对外来或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却总是被轻视或者忽略。在城市的精英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分化”，他们只知道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既然如此，自然就会出现差距和分化。支配阶级试图用开放社会来取代阶级社会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开放社会对阶级社会的“取代”是在国家与资本论述的充分构思和严格管制之下进行的。因此这个“取代”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被市场合法化的“政治过程”。

6. 当中国政府允许农村流动人口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需要的时候，既是它开始了这个无产阶级化过程，同时又是它抑制了这个打工阶级的形成。

7. 在当代中国，社会和阶级的分化，不是由资本主义机器在市场逻辑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而是由国家制造出来的，它将私有财产没收并将其变成“国家财产”，然后根据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分配给不同的社会部门。

8. 这种对肉体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它才能形成一种劳动力（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

9. 语言的对抗，尤其是车间的方言政治，进一步加剧了对城/乡、地方及族群等身份认同的争夺。语言是一个差异的系统，是在诠释社会事实的社会性差别、层级体系，以及分化等共同构成的网状结构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正如Bourdieu (1991, 52-54) 所言，合法性语言的斗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对身份认同、地位，以及权力的争夺。身份认同政治深陷于语言政治之中。一个人说什么方言，带有什么地方的口音，这些都至关重要。在工厂中，一种方言的层级体系被有效地运用到「语言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是与围绕工位、资源，以及权力而展开的斗争。

10. 总之，次文学是大众忧虑（literature of people's concern）的文学。从来没有个体化的主体，只有集体汇集而成的声音，只要它们不是无中生有，只要它们仅是作为即将出现的破坏性力量或者建构中的革命性力量而存在的话，它们就是次文学所要表现的主题。

11. 她生命的耗损与撕裂既源于身心失调，同时也具有生物-文化性。倘若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户籍制度束缚了她的流动，那么便是资本主义机器榨取了她的青春与活力，而父权制文化又助纣为虐地将她推入这种绝境之中。三重压迫，我们已经愈来愈接近阿英的梦魇与尖叫了。

12. 如果我们将个人主义视为西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罪恶产物，而将集体主义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危险物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必须既不偏向个人主义（因为它是为资本的逻辑服务的）也不偏向集体主义（因为这个名字它很容易沦为政治策略的牺牲品）地寻找一个能够对个体性与集体性进行反叛和重述的抗争议程。打工主体正在寻求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并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化的抗争逻辑（它经常导致劳工的主体性在运动中被吸纳）。因此，打工主体应该开创一幅崭新的反叛图景，它是多阵线的，纵横交错地点缀于个体与集体层面之上，它所对抗的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因素，而且还有文化和心理经验。

15、《中国女工》的笔记-第187页

倘若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户籍制度束缚了她的流动，那么便是资本主义机器榨取了她的青春与活力，而父权制文化又将她推入这种绝境之中。三重张力，我们已经愈来愈接近阿英的梦魇与尖叫了。

16、《中国女工》的笔记-第187页

阿英对生活的焦虑不难理解，她生命的耗损与撕裂既源于身心失调，同时也具有生物——文化性。倘若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户籍制度束缚了她的流动，那么便是资本主义及其榨取了她的青春与活力，而父权制文化又将她推入这种绝境之中。

180提供神秘药片是工厂控制女性审题的一种常识，它试图改变女性时间的刘翔，并将其导入规训时间的主流之中。马克思所指的劳动市一中无性劳动，而他所提出的劳动异化也是所有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共同经验。我想强调男工与女工所经历的劳动异化在本质上存在着生理性别以及社会性别的差异。由于女性的生理、审题以及时间感等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工业化时间模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因此相比于男性，女性可能处于更加尖锐并且深刻的异化力量控制之下。征服女性时间并非易事，而控制女性审题更是难上加难。经前综合症、痛经、产假以及各种妇科疾病都是令资本主义及其束手无策的女人问题。女性劳动者之所以遭到贬低和歧视，正是因为生产机器难以将女性时间导入工业时间的轨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主导的世界里，女性不仅作为性的主题居于此等地位，而且作为劳动主体也是同样。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坦言：女性受到双重异化的压迫：一是作为女性，一是作为劳动者。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这双重异化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彼此强化的？一方面，由于工业时间与女性时间相冲突，因此作为女性，工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被严重异化；另一方面，作为工人，女性与自身在家庭中的生物——文化生产相背离。昏晕不仅是一种病征，而且也是由于女性身体按其自身规律而存在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它揭示出工业时间的暴力及其试图将女性身体改造成为劳动机器的失败。

17、《中国女工》的笔记-第73页

认为阶级分化（尤其是工农之间的明显分化）是国家故意在人民中制造出来的看法，当然有欠公正，但是说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固有的发展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副产品，则无疑是可以接受的（Seldon,1993;White,1993）

18、《中国女工》的笔记-第180页

昏晕——身体疼痛的极端体验——被视为女工对规训程序所发起的根本挑战。昏晕不仅是一种病征，而且也是由于女性身体按其自身规律而存在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它揭示出工业时间的暴力及其试图将女性身体改造成为劳动机器的失败。

《中国女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